

张小红 / 编

陶品孫百歲誕辰

紀念集

JINIANJI

百家出版社



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

张小红 编

丁景唐 顾问

百 家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姜逸青

封面设计：卢蓓苓

封面题字：王宽鹏

陶晶孙百岁诞辰纪念集

张小红 编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11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76-916-8/Z·55

定价：16.0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丁 景 唐

1997年12月18日,是中国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早期成员、中国左翼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与主要成员陶晶孙(1897-1952)的百岁诞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虹口区图书馆共同联署,于该日在虹口区图书馆举行“陶晶孙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也是陶晶孙先生45年前患肝癌病歿日本后,在他生活、工作与战斗过的上海为他举行的第一次追思会。

出席陶晶孙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座谈会的七十余位人士中有来自日本、北京、南京的陶先生亲人,有四家发起单位的同仁,高等院校、文学研究所、文化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及新闻界人士,还有来自陶先生家乡——无锡市的代表。与会人士的发言,殷切缅怀陶先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坦荡正直淳朴宽厚的品格,阐述和赞扬了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创造性成就和左翼十年文学运动中的业绩,以及他对中日人民友好、文化交流的贡献。

会议期间,自京来沪的陶先生的妹妹90多岁高龄的人民教师陶瀛孙因骨折卧床不能出席会议,由她口述,请她的学生高建国整理了发言稿在会上宣读。陶先生的次子陶坊资代表留日的陶先生家属特地由东京飞抵上海出席会议向与会人士表示谢忱,并着重介绍了陶先生与日本文化界人士的友好往来,日本友人悼念陶先生的情况,以及陶先生遗著《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的广泛思想影响。

与此同时,四家主办单位还举办了“陶晶孙诞辰 100 周年生平事迹展”,纪念会场四周悬挂着陶先生的几十幅照片:与家人生活照,与创造社同人照,上海艺术剧社演出《西线无战事》时与夏衍的合影,1939 年与内山完造在鲁迅墓前合影,还有《音乐会小曲》、《大众文艺》等书影,构成了纪念座谈会亲切的气氛。与会人士在充分交流发言之外,还得到了四家发起单位与中国现代文学馆、郭沫若纪念馆共同印制的精美的富有收藏价值的“陶晶孙百岁生日”纪念明信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版的《陶晶孙选集》(夏衍作序,1995 年 5 月出版)。

根据陶先生家属的意愿和与会人士的共同要求,我们编印了这本《陶晶孙百岁生日纪念集》,既寄托我们对陶先生的缅怀之情,也留下一本可供纪念与研究的专册。

收入纪念集的,有陶先生的妹妹陶瀛孙、弟弟陶乃煌和陶先生的哲嗣陶坊资、陶易王写的有关陶先生生平和纪念文章,有此次纪念座谈会上的专家学者的发言稿和此次未能来沪与会的学者的研究论文,也有日本友人的回忆与纪念文章。还在集子的最后,编入了坊资的《晶孙年谱》和卢正言的《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两份重要资料。

这里需要向大家一提的,这本纪念集中编入已故两位陶晶孙的知己朋友、老战友郑伯奇和夏衍的遗文。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评论陶晶孙成名作《木犀》与《音乐会小曲》的一段文字,夏衍为《陶晶孙选集》所撰序文。这两篇文章具有特殊的、历史的意义。郑伯奇(1895—1979)是二十年代初与陶晶孙同期的日本留学生,创造社的元老、上海艺术剧社社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与七位常委之一,与陶晶孙结交时间最久的一位老朋友。郑伯奇编选并作导言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935 年 8 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4 月根据原版影印)专收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创造社作家

小说,导言从宏观纵论第一个十年创造社的成立、发展和作家作品。郑伯奇的文章是评论陶晶孙作品最早的重要论文。夏衍(1900-1995)是上海艺术剧社的主将、也是“左联”的七位常委之一,九旬老人夏衍撰写的《陶晶孙选集》序文(199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老友陶晶孙作证,还他以历史的真相,作出全面的评价,成为陶晶孙研究的一篇历史性文献资料。收此两篇,为本书增添光泽。当为关心陶先生的中日友好人士所珍视。

在这次“陶晶孙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不少与会者提出希望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版《陶晶孙选集》、第一次举办陶晶孙纪念座谈会之后,能第一次编辑出版陶晶孙纪念集。现在这本纪念集的编辑出版,权算是响应友好呼吁的回答。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为开展对陶晶孙的学术研究,挖掘更多的资料,写出诸多方面的论文,在文艺百花园地里和中日文化交流中绽放新的花朵。

末了,还要谈一点本书编辑方面的事情。本书是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红同志在陶先生的家属陶瀛孙、陶乃煌、陶坊资先生的大力支持和中日学者专家的协助下,精心编选而成的。小红同志是上海举办的“陶晶孙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主要筹备者之一。她和其他同志一起为这次成功地开好纪念座谈会作出了努力。我们还要感谢上海虹口区文化局领导、上海鲁迅纪念馆、左联会址纪念馆、虹口区图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心协力,才使纪念座谈会圆满成功,也才促使这本纪念集的编辑出版有了坚实的基础。陶先生的家属和小红同志让我过问一些编辑出版方面的事务,并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有不当之处,敬请海内外朋友们指正。同时,书中有些史事与材料有不够一致或错误的地方,也望赐教!

目 录

纪念我的哥哥陶晶孙	陶澹孙 (1)
怀念陶晶孙	陶乃煌 (4)
陶晶孙二三事	陶乃煌 (8)
回忆我的父亲	陶坊资 (11)
父亲在台湾	陶易王 (16)
陶晶孙与“左联”	陶澹孙、陶乃煌 (19)
谈陶晶孙的小说《木犀》和《音乐会小曲》	郑伯奇 (23)
《陶晶孙选集》序	夏 衍 (25)
纪念陶晶孙先生百年诞辰	丁景唐 (27)
被人淡忘与歪曲的陶晶孙	王湜华 (42)
关于陶晶孙的评价问题	王锡荣 (50)
记夏衍为《陶晶孙选集》写序	丁景唐 (54)
还他清白名	袁 鹰 (58)
给陶晶孙出书有感	王观众 (61)
陶晶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感言	陈青生 (63)
中国社会医学的开拓者	蒋本沂 (66)
陶晶孙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	刘 平 (70)
一位不应被文坛忘却的人	应锦襄 (88)
一朵柔弱美丽的花——论陶晶孙的小说创作	杨剑龙 (97)
美的是你自己	张小红 (111)
《牛骨集》枝谈	潘颂德 (122)

陶晶孙与中国现代木偶戏	丁言昭 (127)
陶晶孙与鲁迅	张小红 (132)
致夏衍的信	伊藤虎丸 (142)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泽地久枝 (145)
陶晶孙其人及作品	须田禎一 (150)
追忆与业绩	柘植秀臣 (166)
一海相隔 血链相系	泽地久枝 (171)
《落第秀才——日本》	吉田富夫 (204)
陶晶孙与艺术剧社	尾崎秀树 (206)
中国人对日本的卓越评论	中泽孝之 (213)
日中的纽带：追忆陶晶孙的事绩	中村悖二 (215)
出自爱心的言词	仓石武四郎 (220)
对明治日本的怀念	竹内好 (221)
流入近代东洋文化的激情	草野心平 (222)
陶晶孙年谱	陶坊资 (223)
陶晶孙著译作品目录	卢正言 (232)
编后记	张小红 (260)

纪念我的哥哥陶晶孙

陶 瀛 孙

陶晶孙在家中排行第三，是我的三哥；我在家中排行第八，是他的八妹。我们出生在无锡一个大家庭中。我们的父亲陶廷枋，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老会员，思想进步，向往社会革新。为此，在晶孙 10 岁那年，父亲便带他东渡日本，去日本学习。晶孙在日本连续生活了 23 年。

晶孙虽然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医学，但却酷爱文学与音乐，他 24 岁那年，与同窗好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并创建了“创造社”。其后，他在《创造》季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了处女作《木犀》。这篇浪漫的爱情小说，晶孙分别以中、日两国文字写出，由郭沫若撰文特别推荐，受到中日文学青年的热烈好评。承蒙著名编辑家丁景唐先生及人民文学出版社费神，晶孙的这篇处女作已收入《陶晶孙选集》，可供后人研读。

晶孙与郭沫若共同从事“创造社”工作时，与郭沫若夫妇一同在日本箱崎海岸抱洋阁。其间，晶孙常和郭沫若互赠诗歌，一唱一和。承蒙各主办单位费神，今天又专门展出晶孙为郭沫若诗歌谱写的歌曲总谱《湘累的歌——赠郭夫人安娜》，使我仿佛又看到了晶孙与沫若两位好友昔日年轻潇洒、英姿勃发的身影。

就是在抱洋阁的这段日子里，晶孙和前来探望姐姐安娜的纯情少女弥丽相识并且相爱。弥丽十分敬爱晶孙的才华与为人；而晶孙则十分欣赏弥丽对爱情与事业同样执著的性格。在安娜与郭沫若夫妇的热烈赞同下，晶孙与弥丽结为夫妇。安娜与弥丽这一

对姐妹,先后嫁给了“创造社”的两位中国作家,至今仍是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9年,晶孙与弥丽一同携子返回中国,定居在上海虹口区。在其后数十载的动荡生活中,晶孙与弥丽始终相爱相助,至死不渝。

晶孙回国不久,便从好友郁达夫手里接过《大众文艺》,担任该杂志的主编,并使其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为中国的进步文化事业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那段时间,晶孙常去内山书店等处,与鲁迅先生见面,向他请教。他与鲁迅先生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今天展出的一幅他与内山先生同谒鲁迅墓的照片,便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那段时间,晶孙除了主持《大众文艺》的工作,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戏剧、散文,如《勘太与熊治》等。他并且和日本名记者、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尾崎秀实合作,编译了田汉等多位中国进步作家的作品,将它们汇编成《烽起》,由晶孙撰写序言,介绍到国际无产阶级读者和广大进步人士中去。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晶孙在中、日文坛都有较高声誉,并与日本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他的老友潘汉年以党的名义要求他放弃个人利益,留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为党和中华民族从事隐蔽工作。晶孙不辱使命,曾经很好地完成了潘汉年布置的这些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使他个人蒙冤受辱,却使中华民族得益。为此,他觉得自己的这些牺牲、这些痛苦是值得的。这中间的部分情况,已由夏衍同志写出,并刊载在《陶晶孙选集》中。

抗战胜利后,1946年陶晶孙与潘汉年商量并经过潘汉年批准后,前往台湾,后又转到日本。在日本,他除了从事医学与教学工作外,继续以日语进行文学创作,促进中日友好、世界和平。他在作品中曾多次呼吁,在二战中侵略他国却又失败的日本,今后应走和平建国的道路,更应维护和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1952年,晶孙因患癌症在日本去世。日本各家报刊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并发表悼念文章。这一切,不仅由于他在日本文坛享有较高的地位,也由于他是一位长期促进世界和平、中日友好的反战人士,一位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

多年来,日本人民没有忘记晶孙。日本文学界将晶孙的遗作汇编成文集《给日本的遗书》,出版了三次。日本友好人士将此书誉为“应该反复阅读的书”,视为中日友好的具体象征。弥丽逝世后,日本人民又为安娜与弥丽建造了“姐妹亭”,并在碑文中追叙安娜与沫若、弥丽与晶孙曾为中日友好作出的种种贡献。晶孙九泉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了。

由于历史的一些特殊原因,晶孙在以前一些年中曾在内蒙受冤屈。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已还晶孙本来面目,并为其恢复名誉。晶孙九泉有知,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晶孙那样深切地挚爱他的祖国和人民。如今,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正以更雄健的步伐迈向二十一世纪。这正是晶孙曾经梦寐以求的啊!

高建国整理

1997年12月18日

怀念陶晶孙

——写在陶晶孙诞辰百年纪念之际

陶 乃 煌

今年12月18日,是陶晶孙(1897.12.18—1952.2.12)的百年诞辰。

陶晶孙幼时随父亲东渡日本,经小学、中学、大学及至从事音响生理学和医学的研究,连续居留在日本达23年。他对文学、音乐、绘画和自然科学有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1月应上海东南医学院之聘回国前后至1932年之间,他的文学活动最为活跃。他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在《创造季刊》、《创造月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小说和剧本。他继郁达夫之后主编《大众文艺》(1929年6月),提出要面向大众,“要登大众作家的作品,要用大众能懂的文字,要利用大众能理解的浅近的表现,要通俗化,要大众化”,“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他和郑伯奇、冯乃超、沈端先(夏衍)、叶沉(沈西苓)组织艺术剧社(1929年11月),筹备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2月、3月),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还是中国现代新兴木偶剧的倡导者和奠基人,开拓了中国木偶剧的新天地。

1930年9月30日,国民党密令取缔“社联”、“左联”等组织,通缉一批进步人士,陶晶孙被列入通缉名单。但他并没有停止文学活动,他一边从事医学工作,一边继续为“左联”的进步戏剧运动工作。1931年10月,他与日本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合作,在日本四六书院出版了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的戏剧集《蜂

起》，并为此书作序。四十年代上半期，他困居上海，在医学院授课，写一些散文随笔和回忆创造社的文章。四十年代下半期在台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卫生系教授兼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5月，为避台湾当局迫害，迁居日本，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重新投入文学活动，用日文写作。他热爱新中国，讲授介绍中国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文学作品，为日本报刊撰写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文章。1952年2月12日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病故，英年早逝，令人痛心。

抗日战争时期，晶孙密受潘汉年的嘱托留居上海。他既要与留沪的日本朋友（如内山完造、佐藤俊子等）交往，也要与他心中厌恶的另一种日本人周旋，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坚持反对侵略和团结抗日的立场。但这些事情并不为人所知，致使他长期遭到误解和身负恶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抹煞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历史真相不应被长期湮没。

作为晶孙的亲属，我们觉得有责任向文学界介绍事实真相。这个想法得到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文化战线的领导人夏衍同志和我国现代文学史专家丁景唐同志的热情赞同和支持。

我们于1990年“左联”成立60周年之际在夏衍同志的鼓励下，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陶晶孙与“左联”》一文。随后，《新文学史料》于1992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6篇关于“陶晶孙研究”的文章，从各个侧面介绍了晶孙的主要业绩和生平。

也是在这一年（1992年）的初冬，丁景唐同志着手编纂《陶晶孙选集》。他收集查核了三十年代前后的各种文史资料，《艺术》、《大众文艺》等各种书刊，和晶孙作品的不同版本，对晶孙的生平和业绩进行研究、考证和校勘。他精心编选，力图在有限的篇幅中反映晶孙的文学业绩，并在其《编后记》中对晶孙的生平和作品做了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评论。编选工作历时两年有余始得完成。

《陶晶孙选集》于1995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的出版,进一步澄清了几十年来被歪曲的事实,恢复了晶孙作为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之一的本来面目,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研究线索。

夏衍同志在为《陶晶孙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虽然晶孙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我不会忘记我们相知、共事的那段岁月。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是夏公于1994年11月在病榻上所写,也是他生前所作的最后一篇序言。他的这种对故友的深情和对历史的负责精神,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敬佩。

早在晶孙逝世后不久,日本友人即将他的日文作品编成《给日本的遗书》一书。这个书题是由熟知晶孙心愿的日本友人所选。日本文化界曾给此书以高度评价,称之为“优秀的日本文化论”。此书初印于1952年10月,由创元社出版,后于1963年5月由普通社增订再版。现在又由东方书店于1995年7月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再印新版。新版增加了其子陶棣土于1995年5月写的回忆文章,以及伊藤虎丸写的《战后五十年与〈给日本的遗书〉》的长文,详细介绍该书的背景、作品内容和战争结束50年后再次印行的意义。

《陶晶孙选集》和《给日本的遗书》的新版于1995年同时问世,可以说既是巧合,也是必然。这也说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界人士对他的思念之情。

这里要追忆一些关于晶孙的医学活动。这方面他惯用陶炽孙的名字。他1929年任上海东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授。随后同时在无锡开办厚生医院,为乡里平民治病,并设公共卫生实验区,兼任无锡实验卫生模范区主任。1931年应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聘为研究员。他医学的主要业绩在于研究公共卫生学和寄生虫

学。他曾明确指出,“以中国卫生调查为研究主题,预备在十年之间造中国环境卫生调查之清册,以便革命成功后,医事卫生家做事业可以有所依据。”“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社会的病因,……这是国家开始建设时我们研究家的贡献。”(1945年)

陶晶孙与夫人陶弥丽感情弥笃,患难与共,相互忠贞不渝。弥丽于1993年11月逝世,时年96岁。次年(1994年5月),日本宫城县大衡村为出生于该地的佐藤安娜(郭沫若日籍夫人)与弥丽姊妹建立了纪念碑,表彰她们双双与中国的郭、陶结婚后,架起了联系中日的桥梁,促进中日人民之间友谊的功绩,从而将两人的不平凡的一生涯永传后世。我想,此事对晶孙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1991年1月,我和妻子王月如在晶孙之子坊资、易王陪同下,前去市川市的墓地扫墓。在开阔的花园墓地的一隅,晶孙的墓基上竖立着一块方形的黑色晶莹的墓碑,上面刻着他手书的两句话:“飏风从井里起,洪水从沙漠来”。我们送上一束鲜花,为墓基周围的花木浇水。又是六年过去了,晶孙其人及其业绩,正在被文学界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值此晶孙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短文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

1997年7月15日

陶晶孙二三事

陶 乃 煌

家兄陶晶孙（三哥）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文学家、医学家，同时也是爱好音乐和美术的行家。而在我心目中，他又是一个乡土观念重、富有幽默感和人情味的、颇有书生气的学者。

关于他的生平，近几年陆续有所介绍，不赘。

晶孙在上海主要是住在虹口区的，即现在的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和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晶孙在施高塔路住了十年（1937 - 1946年），而我自1938年9月在上海大同附中读书，1941年进入上海德国医学院学医，在此期间（特别是在医学院期间）我和晶孙多有接触，谨志二三事以为怀念。

1. 满负荷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要到东南医学院（在今淡水路）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在今岳阳路）上班外，还在做许多其他事情：整理陶烈（四哥）遗著，由于遗作大多是原始稿件，而且专业性很强（脑之研究）需要分类、核对，文章中的德文、英文、日文的段落或词语也要翻译和编辑；编排自己的《陶晶孙文集》，计划是六卷，常见到他在剪裁修改原稿和自己设计勾画扉页的花饰图案；负责主编《现代医学》杂志，要组稿和筹集印行经费；在重庆南路（原名吕班路）开了一家“现代科学书店”，销售科技图书，职员仅一人。以上各事，除了《陶晶孙文集》的设计编排外，我也都参加了翻译、校对，联系某些文章作者，跑印刷厂和照看书店等工作。当然晶孙还有

与朋友的许多联系和交往,以及应付当局名式各样的干扰。可以说,他的工作节奏很紧张。

2. 淡泊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晶孙有一段时间单独住在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后住回施高塔路。这里是一所三层楼的房屋,底层是起坐间,二楼是晶孙的卧室兼工作室,三楼是孩子们住的。此时,妻儿们在日本,他们大概是1941年回到上海的。二楼摆设很简单,不大的书架,敞开的简易木质书架,随意放着各种书刊。他有时喜欢坐在矮矮的沙发上,或席地坐在一个棉垫上。晚上也就是这样接待来访的年轻朋友。他最常用的饮料是不加糖和牛奶的咖啡,把咖啡颗粒放在一个小水壶煮开,再用一个带把子的小筛子把渣粒滤掉。冬天,在房间中央放一个火钵,在垫着草木灰的钵内烧上两三个小炭团烤火,放上一个小铁架可用以煮水或煮咖啡。这已是可以供他感到满意的一个工作氛围了。

3. 忙里消闲

晶孙平时沉默寡言,由于各种事情头绪很多,也实在没有什么空闲的时间。我们见面也总是谈“工作”,但也总会有茶余饭后的时间,海阔天空地聊聊。我们会谈到歌德、席勒和海涅诗歌的异同,谈到日本和德国医学教育方法的差别,议论我国医学卫生事业和前景,也谈到中世纪的瘟疫和卜伽丘的《十日谈》,以及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讽刺,谈论当时报刊上某些杂文的无聊,等等。现在想起来,异乎寻常的是我们比较少谈家庭的事,需要谈到时也几乎是简要的“情况通报”。我们通常较多地是晚上在他施高塔路家中和白天的在自然科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工作室)里,但偶尔也有约好在某个小店,如王家沙的一个点心店,或北四川路上的一个日本式料理店见面,简单地要一个鸡丝面或红小豆饭。他也曾到当时的公济医院来找我,一起漫步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和外滩。他那时已是人到中年,以瘦弱之身经受着他在学生时代所没有接触的社